

评孔纪年

1911—1949

1911——1949

评 孔 纪 年

韩 达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1911—1949

评孔纪年

韩 达 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7插页 377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60

书号 2275·6 定价 2.30 元

前 言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人。他的言行著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我们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不容忽视。

然而，孔子毕竟是一个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其学说本来是一家之言，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何况，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他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把他捧到吓人的高度，尊之为“至圣”、“素王”；他的学说也演变为僵化的教条，吃人的礼教，成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因之，辛亥革命以后，在新旧思想的激烈斗争中，他首当其冲，被指为“国愿”、“盗丘”、“孔家店的老板”，成为被打倒的罪魁祸首，兴起一种世所罕见的评孔思潮。这一思潮，由于把政治性的尊孔、反孔与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论争混为一体，显得异常复杂，所以，六十多年来这一思潮时起时伏，形成众说纷纭，毁誉不一，莫衷一是的局面。其实，只就学术上的论争来说，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是孔子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一是孔子的学说思想应否批判地继承？这两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下功夫研究的重要课题。

为了继承我们伟大祖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看来，科学地评价孔子，应该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职责，对孔子的研究也势必继续深入下去。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大家在评孔中了解过去，吸取前人的经

验教训，并在他们已经取得某些成果的基础上奋勇攀登，编了这本专题资料——《评孔纪年》，提供大家在科研和教学中参考。

本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搜集、选用了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八年间有关评论孔子的材料，采用长编纪事编年体，力求通过具体的学术评论和评孔活动，客观地反映这一思潮发生、发展的真实面貌。本书完全取材于公开的书、报、杂志；以反映学术评论为主，评孔活动为辅，并注意采取有关教育的资料；对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人物和争论较大的问题，着重反映，但对一般人物的一得之见，也不遗漏；有关学术观点的条文，多用作者原文，便于读者引用。本书稿曾向国内中国教育史专家毛礼锐、方庆瑛、卢庆宜、沈灌群、陈景磐、陈学恂、张瑞璠等同志请教，并提交过全国教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1983年在曲阜召开的孔子讨论会上，作为大会资料，散发了打印稿，收到宝贵的意见，受到热情的鼓励，特别是匡亚明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赶写了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的章咸同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守智同志大力协助，为本书搜找资料、校对、抄写书稿作了不少工作。由于资料浩繁，水平、人力有限，误、漏、失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以便修订。

韩达于北京

1984年1月5日

序

摆在面前的这本书，把我的思绪带到辛亥革命至解放战争那些风云变幻的年代。时间算起来并不长，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先是跟着孙中山进行反清、反袁、反北洋军阀和反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又跟着共产党、毛泽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接着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一次次大的斗争不仅在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进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进行，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这里没有刀枪，但思想上的交锋同样是激烈的，而对孔子评价历来是思想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从本书系统收集的材料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反动政治势力，都利用夸大孔子思想中确实存在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糟粕（这是必须批判舍弃的），而掩盖孔子思想中同样存在的某些人民性、民主性的积极因素（这是应该发掘汲取的），而把孔子打扮成封建主义旧传统的化身，打扮成历代反动思想的鼻祖，煞有介事地鼓吹尊孔读经，实则为了粉饰他们倒退复古，用以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科学和共产主义。进步的和革命的人们，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痛斥反动派的尊孔谰言。他们对孔子的批判曾经起了揭露敌人，教育和鼓舞人民进行斗争的积极作用。

这本书收集的许多材料，我当年虽从报章杂志上读到过，今天看了使我记起当时的斗争生活，重温当时或愤怒、鄙夷，或欣喜、激昂的心情。

这些材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也反映了当时孔子研究中阶级性、党派性的复杂背景。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利益而坚持反动政治立场的官僚、政客学者，重弹尊孔读经的陈辞滥调，当然不可能把孔子研究推向前进。许多进步的和革命的人们揭露了孔子保守的乃至反动的一面，把孔子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然而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他们没有能够实事求是地把真孔子和假孔子即孔子本身和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偏见、私见而有意神化、偶像化的孔子区别开来，没有把孔子思想的糟粕和精华区分开来，对孔子往往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马克思主义者对孔子采取了严格而全面分析的态度。李大钊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毛泽东一面批判与孔子有密切关系的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一面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种分析的做法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一位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他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封建社会的巩固，封建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共同心理与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有巨大作用。我们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分析和鉴别前人研究的成果，对孔子思想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去伪存真，去非存是，去糟粕存精华，使之成为有利于当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

素。

韩达同志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但有很长一段时间身处逆境，未能充分发挥其所长。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虽已年逾花甲，但是壮心不已，积极投身中国教育史和孔子的研究工作。研究孔子，又是从一些人不愿做的资料工作入手，花了很大气力，历时数年，编成这本很有价值的史料性的书，对全面研究孔子，评价孔子，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丰富资料，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些资料出发，深入研究，进一步对孔子做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恢复其真面目，摧毁其假形象，古为今用，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十二大宏伟目标而积极奋斗，勇往直前。是为序。

匡亚明

1984年4月11日在南京。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任都督，号召国民“共图光复事业”，“建立中华民国”。同月，康有为作《救亡论》、《共和政体论》，反对建立共和政体。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时，万无立民主之理也”，“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主张保留清帝，建立“虚君共和国”，由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的孔子七十六世孙“衍圣公”孔令贻监国摄政。

《不忍》第7册

十一月五日 中国社会党发表教育平等等八条党纲，江亢虎解释其纲领说：“多与三代井田，学校制度及孔子《礼运》所称道者，先后一揆”。

《江亢虎致袁世凯信》见《社会世界》第2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论及虚君共和制时，对以孔子之裔衍圣公晋级为皇帝一说，提出三条疑义：一、“若非现皇帝禅让，则友邦不易承认。而禅让之事，恐不易期，南北相持久，是否能保国中秩序，秩序既破，干涉是否能免。”

二、“孔子为一教主，今拥戴其嗣为一国元首，是否能免政教混合之嫌，是否能不启他教教徒之疑忌。”

三、“蒙、回、藏、疆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驯于本朝之名分，皇统既易，是否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大公报》1911年11月22日

十二月六日 第三者在《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一文中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孔孟虽号教宗，惟所持学说：多阐明道德、政治、哲学之理蕴，不尚信仰，究不得有宗教之效力。故中国人无完全宗教思想，其所同深信仰者，惟神圣不可侵犯之君主耳。”

《大公报》1911年12月6日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一月一日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九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十九日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教育杂志》第3卷第10期

一月 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以“融和国粹欧化”为出版宗旨之一。

《中华教育界》创刊号

二月二十八日 本月孙中山辞职，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二十八日，马裕藻等在杭州发起组织国学会，举章太炎为会长。该会设：小学（音韵训诂），经（群经通义），子（诸子异议），史（典章制度，史评），学术流派和释典诸科。请耆儒硕彦分科讲授。

《民主报》1912年2月28日

二月二十九日 临时政府内务、教育两部通电各省举行

丁祭。略谓：“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之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唯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辛亥革命资料》

四月 蔡元培发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认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德、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他说：“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者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提出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的新教育方针。他认为公民道德教育，就是“自由、平等、亲爱（博爱）”，也就是孔、孟“仁”、“义”、“恕”的教育。

《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

五月 教育部通电各省改进小学教育各点中，重申“废止读经”的规定。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

六月 山西军政要人赵戴文、景定成、张瑞等在太原成立“宗圣会”。声称：“宗礼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以宗孔子及群圣先哲，阐明人道，辅助政教，促进人群进化，民族大同为宗旨。”

《孔教十年大事记》第7卷

六月 王锡蕃、刘宗国、薛正清等在济南成立“孔道会”，“以讲明圣学，鼓励行宜，陶淑人民道德，促进社会文

明为宗旨。”次年该会移北京，以直隶都督冯国璋、陕西都督张凤翔为名誉会长，康有为为会长。

《孔教十年大事记》第7卷

七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对学校可拜孔子这一提案，经代表再三讨论，认为“孔子非宗教家。尊之有其道，教育与宗教不能混合为一；且信教自由，为宪法公例，不宜固定一尊。”但考虑到，若此案明白宣布，恐怕引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仍把“孔子诞日”列入学校自定仪式一条内。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八月八日 《时报》报道：“四川省各社团近致电北京教育部，称教育分司程昌祺，妄将渝城巴县文庙拆毁，住地人民大动公愤，除电都督外，并请教育部教育司重惩程昌祺，以释众怒。”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九月十一日 《时报》报道：奉天都督赵尔巽电致大总统，前派侦探抄得紫贲特旗郡王乌泰所出宣告独立之蒙文告示谓：“不意近日探得中国举动，一则废去孔教，一则主张在蒙古殖民，孔教即废，佛教更不能保，……似此情形，实与我蒙古有绝大之影响，不能不急图自保。”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九月十三日 教育部通电各省，规定公历十月七日为孔子诞辰，全国各校届时举行纪念会。

《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

九月 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并谓“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命令“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

《袁大总统文牍类编》

十月七日 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麦梦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推陈焕章为主任干事。该会有总会和分支会之设。总会初设上海，于1913年迁北京。1914年复由北京迁曲阜，上海北京各设总事务所，分支会遍及国内各县、市、乡、及外洋要埠。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十月十七日 自北京政府教育部通电全国规定孔子诞辰举行纪念会后，全国各地教育界及工商各界、港、澳侨胞，纷纷举行庆祝活动，极为踊跃。广州学生捐集资金预备庆祝物品，并征集学生成绩至时陈列，工商界公议停工休业一天，张灯结采，隆重庆祝。该省教育司长钟荣光，“开牌和举行圣诞纪念。”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十一月 《中国学报》出版。该期刊“以保存国粹阐发新知为宗旨。”第六期刊载康有为题词。马叙伦来启。

康有为提出问题说：“共和有政府议院政党国民，摹欧鉤美，以为政治风俗，而无其教以为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谓之国乎？”他说：中国“虽政治物质之末，逊于欧人，而自有国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蔽矣。”中国之国魂“曰孔子教而已。”“孔子之道”，“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也。”孔子如庄生所尊为“神明圣王。”并说：“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纲纪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黷，家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还说“革命乃吾中国最寻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国数千年之命而革之乎。”他认为“物质固中国所宜急有事也……若今兹之病，则尤以道德为重矣。”“今欲救吾国人于洪水中，必先起道德之心。”“吾今敬告诸君子，诸君子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诚自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

马叙伦说：“诸君子于举世蔽屣孔孟，刍狗伏、郑、程、朱之际，而慨然有挽狂澜，障百川之志，休甚休甚。”

《中国学报》第6期

十一月二十三日 孔教会主任干事陈焕章，以所著《论孔教是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两文，合印成《孔教论》一书，在上海发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德国传教士费希礼为此书写了序言，鼓吹孔教应为中国之宗教。

李提摩太说：“国之有宗教，犹人之有道德，人无道德，则为众弃。国无宗教，则为人役”。“孔教行于中国二千余年，且与释道二教流传于世，世称儒、释、道三教，今忽发生孔教非宗教之谬说，以中国教化最著之邦，历数千年而存在，而能无宗教者，能如是耶。”他认为“孔教偏重政治，而实行则未尝不言灵魂也，故余则认为孔教为一重要之宗教。”

费希礼说：“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故孔教根本之深，不惟在已往，且有功效于将来；不惟深入于中国之人心，且有功效于世界。”“此等根深蒂固之树木，其所结之果，熟而且美，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他认为“孔子生于吾人之前，而其为中国及世界所立许多之目的，尚未能达，且未昭著，吾人

安可不细心研究之。”

程清：《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

十一月 馆章译日人宇野哲人著《满清一代学术思想之小史》一书说：“当孔子作《春秋》时，并无地位与权力，而对于诸侯卿大夫，笔述其事，隐寓褒贬黜陟之意，昭垂后世，俨然居于王者之位，故有素王之称。”“以其具有王法，当受此尊崇也。”“孔子向以尊周室为念，其作《春秋》，亦贯彻此主义。”他认为“欲窥孔子真意，当于《公羊传》得之，而《公羊传》之影响，关于此次革命事业者实大（指辛亥革命）。”

他说：“道咸以降，西学东渐，……而学问界因此混乱。”

“孔子素为人民所信仰，今有因其识见仅及于片隅，而遂抱怀疑之态度者，亦属不少。”例如“以孔子重家族主义与以国家为本的世界潮流不适；孔子重君主统一与世界采自由民权说不适；孔子是伟人，终不足与西洋诸哲相比肩”，“凡此对于孔子之议论，不一而足。”他提出：“孔子三千年来于支那之学问全体，究竟有功有罪，今尚未能分晓。”

《进步》第3卷第1号

十二月十二日 “孔教会”发起人朱祖谋、陈焕章、沈增植、梁鼎芬、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姚文栋、张振勋、陈三立、陈作霖、沈恩桂、麦梦华，草订开办孔教会章程，呈请袁世凯并分递教育部、内务部立案施行。

该公呈略谓：“大哉孔子，累前朝之崇祀，系统国之景行，博稽载籍，凡櫟括传心之学，治世之经，绍往哲而迪来兹者，贤智受其裁，愚不肖亦顺其则，是故垂之为圣范，衍之为宗教，亦固其宜。”并阐明其立会宗旨说：“爰议发起本会，理道有真诠，阐明之以维世变，谟猷有作用，利导之以拯时艰，

洗陋儒之腐谈，振哲学之新绪，俾知经天日月，亘万古其始明，行地江河，汇百川而流衍，正人心，翊世运，将于是乎。”

其开办孔教会简章中规定：在“国内各县皆设支会，各市乡皆设分会，于外洋各埠皆设支会、分会，其重要地点或合若干支会，特设一支会联合会。”在会员一项中规定：“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得填具志愿书，由介绍人介绍入会，”说明孔教会是一国际性组织。其经常会务分讲习与推行两部分：讲习部分：经学、理学、政学、文学四类；推行部分：敷设（讲道化民）、养正（拜圣读经），执礼（考礼正俗）、济众（仁民爱物）四类。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孔教会立案，批文表扬说：“当兹国体初更，异说纷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

次年一月七日，内务部也相继批准立案。其批文谓：“该发起人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并尽纳其事于讲习推行两部，务去浮文，力求实际，见具保存国粹之苦心。”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同年 康有为发表《中华救国论》，他以尊孔救国立论，主张在中国各地均设孔教会，以治人心，他说：“今者保教中国之亟图，在整纪纲，……孔子之为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

《康南海文集》第1册

同年 北京教育部通电各省都督，略谓：“近来各处关于祀孔一事，纷纷致电本部，各持一说，窃以崇祀孔子问题，及祀孔如何订定，事关民国前途至巨，非俟将来正式国会议决后，不能草率从事。”该通电作出两项规定：一、“孔子诞日举行纪念会，以表诚敬。”二、“孔子诞日应以阴历就阳历核算，本月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十月十七日。自民国元年为始，即永以十月十七日为举行纪念会之日。”

陆军部也通咨各省都督，略谓：“陆军各学校于孔子诞日，应开纪念会，以表诚敬，所有开会礼节，应由各该校自行规定。”

《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同年 黄兴留守南京，致电北京政府。谓：“八德在吾国万不可因改例而忽视，名言伟论，薄海同钦！”

《宗教与革命》

同年 王锡藩、刘宗国、薛正清等在济南成立孔道会。该会以“讲明圣学，敦励行宜，陶淑人民道德，促进社会文明”为宗旨。次年该会移至北京，推直隶都督冯国璋、陕西都督张凤翔为名誉会长，康有为为会长。

《孔教十年大事记》第7卷

同年 中国代表钱文选在“孔子道德与万国人种大会”上演说《孔子道德与万国人种大会之关系》。他说：“中华之文明，实基于孔子之道德。”“孔子生平之大义微言，均载于四书五经之内，泰西人士有读其书者，均谓孔子道德，实超乎他教之上。”“我国学堂教授伦理，均以孔子道德为主。”“孔子高尚之道德，后世人民无不受其赐，其教泽，不仅及与中土